

【物语】

从“衣冠缟素”到“神衣象服”

——汉地摩尼形象服饰表现的跨文化转译

张 鹏

【作者简介】张鹏,中央美术学院。

【原文出处】《形象史学》(京),2023.秋.279~297

摩尼教作为自波斯经中亚传入汉地的世界性宗教,其白色特殊法服的形式变迁反映出明确的跨文化色彩。伴随着勒科克、格伦威德尔对高昌回鹘摩尼教绘画的发现^①以及泉武夫、吉田丰、古川摄一等学者于21世纪对于江南摩尼教绘画的再发现,^②关于摩尼教服饰形制的讨论屡屡见诸于高昌回鹘物质文化及摩尼教艺术的先期研究中。^③限于地域的分散性与材料的碎片化,此前对于摩尼及其教众服饰的考证多局限于思考西域与汉地形象表现的单一状态,缺乏系统的联动思考。汉地发现的十余件南宋至元代创作于江南地区的摩尼教绘画与雕塑作品,如何反映在汉地摩尼及摩尼教(明教)的服饰风貌?其与摩尼及摩尼教在波斯肇始之初的文化传统及高昌回鹘时期的图像表现间有何异同?透过服饰内外结构、法服形式及装饰方式的来源及其在汉地嬗变三个方面的讨论,摩尼及其教众在服饰表现上跨越波斯、西域与汉地的跨文化转译方能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汉地摩尼教艺术中的服饰表现

有关摩尼及摩尼教服饰的观察最早始于勒科克,在其针对高昌回鹘摩尼教绘画的观察中,首次注意到摩尼教法服及其装饰的特殊性,并受到学界的研究。^④而在摩尼教传入中国内地并广泛发展的宋元之际,摩尼教绘画雕塑中摩尼及其教众特殊的服饰表现在形式上相对统一。结合大和文华馆藏《冥王圣幛》、藤田美术馆藏《摩尼像》、栖霞寺藏《夷数佛幛》以及晋江草庵的摩尼光佛像。总体可将摩尼及摩尼教在汉地的服饰特征归纳如下。

(1)服饰主体颜色以白为主;

(2)服饰结构上呈现出套头圆领服饰外加可披戴的对襟法服外袍;

(3)法服外袍存在具有底色的装饰镶边,且多为红底加描金纹样,弟子及教众服饰也有镶边,但呈现青、绿及黑色等,与主尊色彩不同;

(4)服饰在肩下及胸前存在四个方形纹章;

(5)出现该服饰结构的人物:摩尼、夷数(耶稣)及摩尼教高级选民。

除四件对人物形象描绘相对细致的作品外,日本私人藏《圣者传图》系列、摩尼教《宇宙图》中也出现了以点景人物描绘的摩尼及其教众。其中人物除前后四处的纹章难以表现外,余者同上述绘画中别无二致。这些特征在江南的摩尼教绘画和雕塑里的主尊、教众形象中反复出现,凸显出汉地摩尼教服饰在借鉴佛道之余自身的特殊文化特质,在所谓“道貌佛身”的特征概念之下,摩尼服饰从内到外事实上呈现出诸多尚待解读的文化信息。

二、回鹘遗影:江南摩尼偶像服饰内外结构辨析

摩尼及其教众服饰的内外结构皆呈现出套头圆领服饰外加可披戴的对襟法服外袍或披风的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看似普通,却同当时汉地的其他宗教服饰及世俗服装存在明显的差异。若从摩尼教汉化后结合教义最为密切的佛教角度加以思考,虽然摩尼教经典中提及过佛教服饰的相关比喻,但实际绘画中的摩尼教服饰的结构同佛教要求的“坏色”“三衣”(trinl civarani)与偏衫等项明显不合,^⑤《圣者传图》2(下页图1)中,位于殿中的摩尼及弟子身前便有

数名明显偏衫并穿着带水田纹的黑色及红色袈裟的佛装人物,与摩尼及其弟子的服饰存在明显的区别。

与此同时,部分国内学者将直裰或道袍作为摩尼服饰整体结构来源,认为摩尼呈现出“道貌佛身”的说法也与实际情况不甚契合。^⑥脱胎于中国传统服饰结构的道袍在隋唐时期便已形成相对固定的规制,并在五代之后全面流行于文人士夫的装束中。^⑦事实上,江南摩尼教绘画如《圣者传图》3中,摩尼背后着乌帽的听者在对襟法服外袍中便穿有交领右衽的直裰里衣(图2),据此将道袍作为摩尼教听者乃至选民所借鉴的服饰来源似乎颇为合理。但若结合宋朝至明朝身着道袍的文人与士夫形象,便可清楚地发现,此类服饰虽然在法服外袍上确实采用了对襟镶边的服饰结构,但里衣却是颇具汉民族特征的右衽交领里衣。右衽作为汉族服饰的标志,自深衣开始便被视为汉服的一般结构;而圆领袍作为一种源自胡服的外衣装束,自隋唐至宋代皆被作为外衣加

以使用(图3、图4)。这类以对襟式服饰为外衣加圆领内袍的内外结构事实上不见于任何其他的汉地服饰表现,形成了一种怪异的服饰形制。而其来源,或可从摩尼教传入的上一节点——回鹘找到端倪。

葛玛丽在《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850-1250)》中讨论高昌回鹘男性的五类服饰结构时,也提到摩尼教与佛教男性信众在身着第一类的圆领衫及第五类的圆领套头镶边服饰外部,套有一件由长布构成、可能与宗教仪式相关的“礼服大衣”^⑧。这里的“礼服大衣”意指各宗教的法服,而类似的服饰结构在高昌回鹘佛教、摩尼教乃至景教绘画的宗教人物表现中皆可得见。如高昌回鹘时期修造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0窟中著名的《僧都统像》,水田纹袈裟内即为圆领套头的红色里衣(图5)。高昌故城景寺中发现的表现棕枝主日场景的景教壁画中,位于前方的引导景僧轻薄的披肩下也可见绿色镶边的套头圆领服(下页图6)。而在摩尼教图像中,不论是高昌K寺壁



图1 《圣者传图》2(局部)



图2 《圣者传图》3(局部)



图3 宋徽宗《听琴图轴》(局部)



图4 元王振鹏《伯牙鼓琴图卷》(局部)



图5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20窟《僧都统像》(9-10世纪)

可以看出:这类在摩尼教绘画与雕塑中出现的服装内外样式很可能正源于回鹘人的服饰传统。

三、波斯与罗马:摩尼法服装饰结构的来源与意义

除摩尼及其弟子服饰的内外结构具有其特殊性外,摩尼及教中重要人物最具象征性的法服外袍本身也值得关注。基于高昌回鹘以及江南摩尼教绘画的实际表现,可见这类服饰包含着一系列复杂的结构:法服外袍存在具有底色的装饰镶边,且多为红底加描金纹样;弟子及教众服饰也有镶边,但呈现青、绿及黑色等,与主尊与重要人物所用色彩不同(图9)。在高昌回鹘发现的摩尼教绘画残片及宋元摩尼教绘画中这类特征呈现出的统一性暗示出。这一特征可能具有在摩尼教内更早的文化渊源。

而关于摩尼所穿着特殊的外部服饰的描述,虽然在早期文献中记述极少,但仍可发现零星的端倪。其中颇为著名的一则记述来源于前文提到过的4世纪时赫格曼尼亚斯(Hegemonius)的《阿基来行传》(Acta Archelai):

他穿着一一种“三角形的尖头鞋”(trisolium),身着一件多色的斗篷,看上去有些飘逸,手里拿着一根非常结实黑檀木手杖。他左臂下夹着一本“巴比伦之书”(Babylonian book),腿上套着不同颜色的裤子,一条是猩红的,一条是韭葱绿的。他的外表就像一个

古老的波斯巫师(麻葛 magician)或总督。(XIV:3)^⑨

作为基督教世界最早的反摩尼教论著,《阿基来行传》罕见地对摩尼的形象进行了具体的刻画,其中所谓“巴比伦之书”可能与摩尼撰写的《生命福音》相关,“三角形的尖头鞋”、斗篷式的外衣以及不同花色的裤子,与“罗马人”的装束格格不入,衬托出摩尼作为异邦来客的身份。长裤与尖头鞋的出现与源出游牧民族的波斯诸王朝密不可分,对比现存分布于萨珊波斯设拉子(Shiraz)周边菲鲁扎巴德(Firuzabad)、比沙普尔(Bishapur)等地所雕刻的大量萨珊波斯雕塑实物,这种相似性便可见一斑。如在卡泽伦(Kazerun)周边岩刻中对时代相近的波斯国王巴赫拉姆二世(Bahram II, 276-293)的表现(下页图10),其飘逸的外衣,多褶的裤腿、腰间类似执杖的长剑以及极富波斯特色的尖头鞋无不可视为这类描述的形象实例。其最后将摩尼描绘为萨珊波斯的巫师或是总督,更明确地表现出这类对于摩尼形象的塑造明显参照于对波斯人的形象塑造,并可视作某种程度上罗马人对波斯人想象模板的表达。^⑩

与此同时,从实物角度分析,现存最早的摩尼教艺术遗物——摩尼的水晶印章中的摩尼与弟子身着胸前带有特殊菱形开口的对襟长袍,也正说明了摩尼的服饰与琐罗亚斯德教中呈现白色、带有边带或纹章装饰的祭司长袍或束腰外衣服饰之间可能存在联系。^⑪在描述琐罗亚斯德教创世的《大本达希辛》(Great Bundahishn)中,象征祭司阶层的奥尔马兹达自身“身穿一件白色长袍,上面印着祭司的标志……因为智慧常在引导人们的祭司中出现,所以所有人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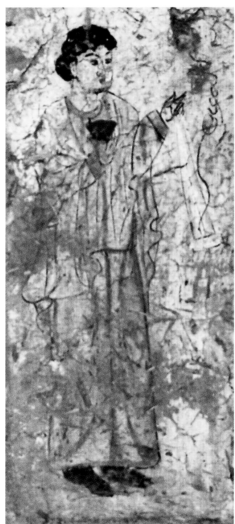


图6 高昌景寺壁画“棕枝主日场景”(9世纪,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图7 高昌K寺壁画MIK III 6918(局部)



图8 摩尼教绘画残片MIK III 4979(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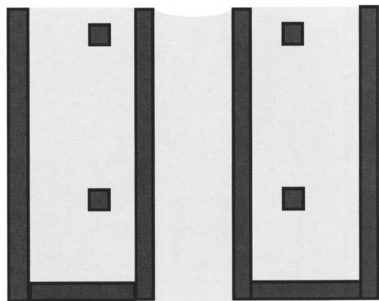


图9 摩尼教神明及重要人物法服的形式结构(笔者绘)

是祂的学生,而创造必须通过智慧进行,所以祂穿着智者的礼袍,即祭司的礼袍”¹²。而在《登卡德》(Dēnkard)描绘世界秩序的内容中也提到“其中之一是祭司的长袍,在其纯洁的境界中蕴藏着对善的安排……在服饰中有闪亮的白色礼袍,在‘善行’中增进善良,去除邪恶”¹³。另依据波斯学者比鲁尼(Abu Rayhan Muhammad al-Biruni,约973-1048)的记载,在代伊月(Dai Month)第一天,波斯国王也需走下皇座旅行祭司的职责,其“穿着白色长袍,坐在铺设在平地的白色地毯上……亲自处理全国和社会上和居民的事务”¹⁴。而在从波斯、中亚到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中亚人的祆教物质遗存中,这类对襟的白色袍服同样并不少见。不论是阿姆河宝藏中发现的麻葛金人,还是波斯波利斯祭司灰岩浮雕,抑或是美秀(Mi-



图10 卡泽伦周边 Sarab-e Qandil 岩刻中的萨珊波斯万王之王巴赫拉姆二世形象



图11 摩尼水晶印章局部

ho)博物馆所藏石棺床中对于祭司的描绘,皆可见到或有条纹或整体为白的这类祆教祭司服饰(图11、图12);在胸前出现纹章的实例虽然少见,但也可见于部分帕提亚钱币所表现的国王装束中。

除了这类波斯化的服饰描述,西弗勒斯·伊本·穆卡法(Severus ibn al-Mu-qaffa‘,?-987)等人修订的《亚历山大科普特教会牧首历史》(Ta'rikh al-Batārikah)则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描述:

他周身穿着一个优良的“阿斯基姆”(āskīm,希腊文:σχῆμα),在它下面穿着一件薄薄的“伊斯蒂哈拉特”(istikhārat,希腊文:στιχάριον,“斯蒂卡里翁”),他裹着的是一件长及双脚的带条纹的外衣,衣服的正面和背面都装饰着人像(figures)。¹⁵

相比起存在明显立场性的基督教文本,这些稍晚出现的材料似乎更直观地反映了另一种对于摩尼服饰的想象。即基于罗马常服丘尼克(Tunic)所展开的服饰想象。与早期佛教美术中常借鉴的托格(Toga)类似,¹⁶长期作为希腊罗马民族服饰的套头外衣丘尼克在古典及中古时代早期皆为地中海沿岸最为常见的常服样式。其整体由一块布匹(白布)制作而成,日常生活中可在腰身部分加以约束。早期的丘尼克作为一般外衣与里衣服饰使用,亚型极多,如罗马人最为流行的丘尼克·阿尔巴(Tunic alba)即为全白的套头外衣类型。2世纪初期,为了区分等级,其加入作为条带的“奥古斯塔斯·克拉布斯”(Angustus Clavus)装饰,以紫、红、赭石、黄等等颜色作为某种早期的等级区分。而在后期的装饰结构中,在服饰位于两肩



图12 阿姆河宝藏中的麻葛形象

与下摆前部位置也增加了以亚麻、羊毛等作为材质的刺绣装饰赛格门特(Segmentum)。2世纪末至3世纪,产生受到东方波斯服饰影响的达尔马提卡(Dalmatica)。其在袖口处加长加宽,并出现前襟敞开的对襟服饰表现。¹⁷达尔马提卡继而在随后实践中为早期基督教所接受,《米兰敕令》后,教宗西里维斯特一世(Silvester I, 285-335)规定执事任何时候需要将达尔马提卡作为法

服外袍着装。其作为法衣后重新加入了复古的“奥古斯塔斯·克拉布斯”，袖子上也存在纹理装饰，同时依照等级对服饰进行了长度与袖子的调整。依照语言学者对原文词汇的校释，该文献中摩尼身上所着的服饰正可能由丘尼克发展而来，条纹与带有人像徽章的装饰结构，也通过随后对于外衣的记述得到了清晰的展现。该文献提及的“āskīm”与“istikhūrat”等词所反映的服饰状貌与同丘尼克为代表的罗马外衣类似，此处描述也可以与《群书类述》中提到的赠予米尔“带刺绣的衣服”相互对应。

丘尼克服饰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加的特征呈现出与摩尼及高级教众服饰高度相关的特点。在部分改造自福音书文本，如将摩尼与耶稣之死混同描述的一则帕提亚语写本 M4570 中，^⑧也展现出更多的信息：

……他(摩尼)失去了知觉，死去了。[两个空行]我主(摩尼)的牺牲(Parinirvāna)也是如此。没有人能比它更光荣了。[最多空缺六行]

……(求你)从我们所面临到的这些事中救赎(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正如他所证明的(帕提亚语：w'gwn nm'yd)。他们像抓罪人一样抓住他。他们就给他穿上袍子(robe)，(给他)一根棍子(在他手里)。他们尊敬他……然后说，“……王，我们的基督！他们就领着他到十字架那里。[八行保存不良或缺失]

(中间省略数行)

……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会看见人子坐在神圣力量的右边，当他自天堂乘战车而来……”大祭司就(撕开)袍子，说，“(到我这里)”。他们又对彼此说，(……)还需要什么作见证呢？我们都从他口中得知(这褻渎的话)，(……)必须杀了他。^⑨

与帕提亚语摩尼教残片 M5569 等真实描述摩尼之死的记载不同，此处摩尼的死亡同基督的死亡交融并置，在凸显出二者转世关系上直接联系的同时，文中也详细提及了基督死前身着长袍与手执手杖的形貌，而祭司撕扯的服饰也与之相对。联系其所参考的基督教传统，这里提及的长袍无疑意指“耶稣的无缝长袍”。《圣经》文本如《约翰福音》(19:23)对这类服饰的形式有详细描述：“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⑩而这种长袍的形制正来自丘

尼克。上文已提到公元 314 年，教皇西尔维斯特颁布了关于教会的法令规定，教会执事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穿着源于丘尼克的达尔马提卡；^⑪而在此之后基督教艺术中对于圣徒的服饰描绘也常采用类似方式，如 6 世纪时位于维罗纳的圣维塔尔教堂北墙半圆拱处的马赛克装饰(图 13)，其中以撒、亚伯拉罕等圣徒便身着这类带有克拉布斯以及赛格门特的束腰丘尼克长袍。^⑫

由此，有关摩尼服饰的文本导向了摩尼服饰结构在西来之前两类可能的来源。一方面，作为帕提亚贵族后裔的摩尼及其眷属在服饰上很可能参照了波斯与琐罗亚斯德教传统下的服饰元素，如对襟的带袖法服外袍、白色服饰等特征在波斯文化中所具有的语境极有可能转移至摩尼的服饰表现中；而另一方面，科普特文本以及摩尼教对西亚的直接借鉴，也说明摩尼的服饰表现可能透过摩尼本人所在的浸洗派，从而受到基督教圣人及教职服饰在装饰结构上的某些特征的影响。与此同时，吐鲁番发现的一则帕提亚语摩尼文残片 M5569 所记载的摩尼教会历史也值得留意：

它是在这颗星星的支配下……在沙列瓦(Shah-revar)月四日，星期一，在胡齐斯坦省贝拉斐(Bēth Lāpāt)的最后时刻，这位光明之父，充满了力量，被带往了他自己的光明之家。在使徒殉难(帕提亚语：pamβrān; Parinirvāna)之后，导师乌兹(Uzzi)向全教会证明了他士兵中所看到的一切。因为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他，乌兹，已经和光明的使徒留在那里了。他向整个教会传达了许多来自使徒的虔诚诚



图 13 拉文纳圣维塔尔教堂北墙半圆拱马赛克装饰“献祭以撒”(526-547)

命。光明使者殉道后,福音书,阿达罕(ārdahang),衣服(padmōžan),和(手杖?) [被带到]……省,……西辛[末思信(Mār Sîsin),? -291或292]。^②

这件传说中所谓摩尼的衣服早已不可考证,但显然,摩尼的服饰作为传法的标志之一,被带给了其继业者末思信。与此同时,从东地中海到西域其中历经数世纪的中间传承虽已难以考证,但来自装饰结构的高度相似仍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着两方来源的可靠性。而摩尼的服饰在高昌回鹘及汉地的语境下也将引发新的互动。

四、从素衣到白衣:宋元织金锦与摩尼服饰装饰结构的转换

高昌回鹘到汉地的现存部分摩尼教绘画中可见摩尼服饰整体的基本结构,而在零星的文献中,摩尼僧众服饰也曾受到记述。吉田丰翻译收录的《摩尼教粟特语文书》(Ch/U 6879)中提到来自“焉耆縹布”(rk-c'ny wš'yny)与“粟特縹布”(swγδ'ny wš'yny)被用于制作电那勿派摩尼教僧众的服饰,^③联系汉文文献中所提及的“安西縹”“木鹿縹”等提法,而其产地可能来自焉耆与粟特的梅尔夫(Merv)地方,也不免让人联想到中亚摩尼教会与回鹘控制下的西域在当时仍来往密切。同时这类“縹布”与在诸多摩尼教账目文献中提及的“官布”[Quanpu;qunp(b)u]材质相似,皆为白色棉布。^④这二者的关系在高昌a寺发现并作为官

方文献的9-11世纪的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中也可窥见端倪:

东、西[城的]所有家园[都要缴]葡萄酒和租子(?)再用62单位的亚麻布去换粗布,用以给高僧制作衣服。^⑤

与文书其他部分所反映出回鹘摩尼僧在饮食与用度上的奢侈做派不同,摩尼僧在服饰上反而更多使用素净的白布,乃至需将亚麻布进一步换为粗布以制作服饰。结合所现存摩尼教绘画残片不难发现,其中的摩尼僧除了较高规格法衣中具有纹章与条带装饰外,在服饰用料与装饰上皆保持着衣面的素净。与此同时,在汉地文本对于摩尼及其教众的服饰的形容中,一个发生在词汇上的细微变化似乎也反映出了某些关键的服饰细节(见表1)。

通过上表可发现,自《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开始的所有提及摩尼僧服饰的相关文本中,对服饰的描绘方式正悄然改变。中唐至北宋前中期,回鹘仍有摩尼教活动,且同汉地不乏存在直接的贸易与朝贡交往。在这一时期的汉文文献中,无一不皆以“素”一字描绘摩尼僧所着服饰。这些描述可以进一步证明此时摩尼教的服饰在衣面表现上应为无装饰的素衣,以至于让李德裕想起汉地丧礼中所使用的“缟素”吉服。另外,文本在描述南宋之后的明教教众时则基本采用“白”字加以叙述,《佛祖统纪》对于为首者则出现了“紫帽宽衫”的说法。文本中暗示出的变

表1 汉文文献中对摩尼教众服饰的记述

“素衣”概念的相关文本		“白衣”概念的相关文本	
申以素帔,仿四净法身……	(唐)拂多诞《摩尼光佛教法仪略》 ^⑥	(大历三年)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大历六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	(南宋)志磐《佛祖统纪》 ^⑦
右阿罗缓已上,并素冠服,唯耨沙嚧一位,听仍旧服……	(唐)拂多诞《摩尼光佛教法仪略》 ^⑧	为首者紫帽宽衫(衫),妇人黑帽白服,称为明教会。所事佛衣白,引经中所谓白佛言世尊	(南宋)志磐《佛祖统纪》 ^⑨
太宗幸灵武,纳降,立回鹘部落置瀚海都督……其在京师也,瑶祠云构,甲第棋布,栋宇轮奂,衣冠缟素,交利者风偃,拔邪者景附,其翎侯贵种,则被我文缙,带我金犀,悦和音,厌珍膳,蝎蠹上国,百有余年	(唐)李德裕《幽州纪圣功碑铭并序》 ^⑩	明教尤盛。……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	(南宋)陆游《条对状》 ^⑪
林瞪,上万人。嘉佑间,闽县前津门火,郡人望空中有人衣素衣,手持铁扇扑灭,遂灭	(明)万历《福宁县志》卷十五《僧梵》 ^⑫	其教曰明,衣尚白,朝拜日,夕拜月	(明)何乔远《闽书》 ^⑬

化与对比在《福宁县志》对于“林瞪”的阐释中更为明显。县志中的林瞪同时身着两种类型的服饰,既有白净的“素衣,亦见”华彩的“象服”。杨富学关于林瞪的考证中,认为该作遗失自上万村,而画面第二层端坐摩尼两侧的选民与听者形象正好对应于修行与受敕封后的林瞪。^⑤虽然该论断尚显武断,但这些材料无疑凸显出摩尼服饰的装饰形式可能发生了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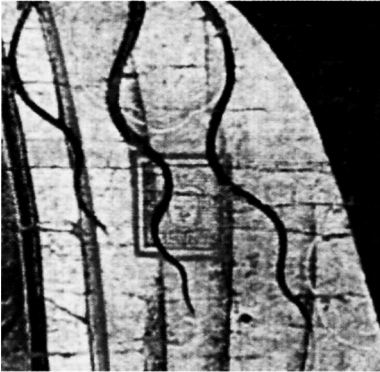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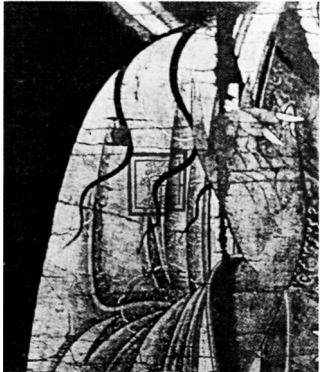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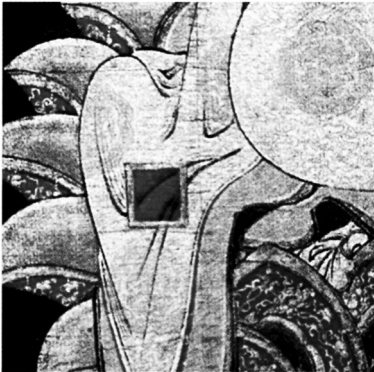
三件江南宋元摩尼偶像乃至日本栖云寺所藏《夷数佛帧》中,对于服饰装饰的表现形式与回鹘摩尼教的神明表现间呈现出诸多不同。《冥王圣帧》中,身着法衣的摩尼在既有的纹章与卷草纹条带装饰的基础上,周身亦为描金的六瓣绣球纹所覆盖,同样描金的绣球纹样也出现在《夷数佛帧》中。与此同时,《夷数佛帧》周身六瓣绣球纹中穿插的大个团花纹样也与藤田美术馆藏《摩尼像》相类似。而在日藏《圣者传图》系列作为点景人物出现的摩尼形象中,两种纹样也同样有所表现。这些实例正可说明这种对摩尼教而言全新的装饰模式已经运用到各种类型的摩

尼教神明描绘中。这类纹样同样可以在同时代的宗教绘画、墓葬壁画乃至实物中发现。同类型的绣球纹可见于内蒙古宝山二号辽墓《贵妇颂经图》中的贵妃服饰,亦见于元代永安寺水陆壁画《往古贤妇烈女众》的局部纹样,乃至14世纪高丽佛画《阿弥陀三尊像》的主尊衣纹(下页图14);而类似的织金团花纹样则与现藏北京故宫的元代红地龟背纹龙凤团花纹织金锦高度相似(下页图15)。

除两种较为典型的纹样外,包含芝草云纹、火焰纹、菱格纹、钱文在内的纹样也出现在江南摩尼教绘画对于弟子、选民及听者的法袍外衣装饰中。^⑥就视觉效果而言,描金或以浅淡黄色勾勒的纹样富丽华美,同时这些纹样又仍统一在整体的白色中。当信众从远处观瞻绘画时,视觉感受仍以白色为主导,呈现出“白衣”的效果;而在近处时,白衣间细密的金色则会带给观者强烈的视觉冲击。

以金及黄色作为摩尼服饰的花纹装饰的做法,首先可能与高昌回鹘细密画传统的转化相关。高昌

表2 汉地摩尼及神明形象中的服饰装饰

绣球纹			
	《冥王圣帧》(局部)	《夷数佛帧》(局部)	《圣者传图》1(局部)
团花纹			
	《夷数佛帧》(局部)	《摩尼像》(局部)	《圣者传图》3(局部)

回鹘现存的摩尼教绘画中虽未在宗教人物的服饰中应用金色装饰,但在画面其余各处,用金装饰则十分普遍。西域艺术中的装饰用金与摩尼教崇奉光明的教义直接相关联,而为了适应中国的传教策略,对于“光明”的表达可能有所调整。另外,被认为回鹘所擅长并进一步流行于宋、金、元的织金锦也可能为摩尼教画师提供了实物资源。诚如《旧唐书》记载“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⑧。唐时起,伴随着唐朝与回鹘的绢马互市,回鹘、粟特族属的摩尼教僧众便开始参与丝绸与织物贸易。^⑨中原王朝与回鹘多次的朝贡与回赐中,也常见摩尼僧参与织物交换。^⑩宋元之际,伴随回鹘内迁与同中原交往的深入,回鹘入学习中亚及汉地既有的织金技术并融会贯通,回鹘长于织金织物的印象更是深深根植于宋、金乃至元代人们的认知中,如宋人洪皓的《松漠纪闻》提及:

其(回鹘)在燕者皆久居业成……织熟锦、熟绦、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又善撚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用粉缴,经岁则不佳,唯以打换达靶。^⑪

这段颇为详细的记述中,回鹘人长于各类织锦织金工艺,并将成品同鞑靼诸部相互交换贸易。该论述也并非孤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对京城宝

津楼诸军百戏的回忆也提及“女童皆妙龄翘楚,结束如男子,短顶头巾,各色着杂色锦绣捻金丝番段窄袍……”^⑫及至南宋,范成大《揽辔录》更直言:“民亦习胡久矣,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秦楼有胡妇,衣金缕鹅红大袖袍,金缕紫勒帛,掀帘吴语,云是宗室郡守家也。”^⑬金人张暉所著《大金集礼》中也将织金锦称为“捻金番缎”^⑭。到了元代,《元史·镇海传》亦云:“先时收天下童男女及工匠,置局宏州,既得西域织金绮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宏州,命镇海世掌焉。”^⑮这些对宋、金、元情状的记载皆可说明,织金锦的技术在此时中原各方人们的文化记忆中长久地与回鹘相关联,而后者是织金锦缎在东西双向的丝绸之路上的朝贡与贸易中最为重要的中转者。元廷所设立专事织金锦局中,亦有两处以回鹘夏都冠名的“别失八里局”,它们无不证明着织金锦在宋元时与回鹘紧密的记忆联系。^⑯

除了来自回鹘文化记忆外,我们也需注意织金锦缎虽多为宋及元代的统治者视作奢靡织物而缕缕禁断,佛画却不在其列,如《元典章》中规定:

佛像、佛经许用金外,其余诸人并不得于造到一切上费用下项金课妆饰:镀金、呀金、搥金、泥金、缕金、捻金、抢金、圈金、贴金、裹金、嵌金。^⑰



图14 高丽《弥陀三尊像》主尊衣纹(局部)



图15 元代红地龟背纹龙凤团花纹织金锦(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这一记载从侧面证明当时诸多的“金课妆饰”于佛教金像上并无限制。相比日常织物,佛画所能采用的技法明显更丰。而在元时,江浙一带也同西域一道成为织金锦的重要产地。“南京、镇江、苏州皆恃商工为活,产丝甚饶,织造数种织金锦、丝绸和其他织物,杭州居民更是‘浑身绦罗,遍体锦绣。’”^⑱文献所

载的江南诸地同样为宋元时期制作遍身织金装饰并出口至高丽和日本的佛画地区。江南画坊的底层画工在藩篱之外的佛画领域中将当地熟识的技术加诸来自回鹘、与佛道相互杂糅的“蕃佛”之上。这也就使汉地摩尼教服饰装饰变得有迹可循。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围绕汉地摩尼及其教众服饰与装饰表现的互动关系。作为宋元时期织金锦重要来源之一的回鹘,在其长期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历程中恰恰并未使用该技术作为其宗教服饰的装饰,而在其流入汉地之后,原有的禁忌却逐渐土崩瓦解,适应于唐代已经存在并在宋元佛画中广泛流行的织金装饰手法。佐以汉地工匠以及民众对于回鹘与织金锦相互关联的文化记忆,本为素衣的摩尼服饰在织金锦缎制作的又一重地江南得以通过佛画的装饰形式以全新的方式遍身金彩,从原本的“素衣”走向“白衣”乃至“金衣”。衍生出新的装饰模式。

结语

摩尼及其教众的服饰作为摩尼教东传阶段中辨识摩尼教特征的重要因素,展现出摩尼教在自波斯近东到汉地东传历程中跨文化传播充满“渐进”与“渗透”的独特面貌。摩尼及其教众结合圆领衫与法服外袍的整体搭配可能与回鹘民族服饰的穿搭习惯相关,而摩尼教法服的服饰结构因素则呈现出波斯及琐罗亚斯德教的服饰特征与罗马流行套头外衣丘尼克的复合,其白衣及装饰的意义可能在当时即已建构,并在其宗教东传及至回鹘的过程中,保持了装饰结构与选材用料的稳定性。

而伴随摩尼教传入汉地并在宋元之际以民间宗教的面貌蓬勃发展于江南地区。包含摩尼在内重要人物的装饰方式与结构发生了置换。在文献针对摩尼教众的服饰描述及江南摩尼教绘画的图像表达中,佛化的摩尼由原本在衣面表现上装饰寥寥的“衣冠缟素”,转变为“白衣”乃至布满织金装饰的“神衣象服”。这一转变可能基于宋元以来佛画用金传统,摩尼教(明教)对光明的理解方式的转换以及彼时关于回鹘长于织金锦的文化记忆于宋元之际跨地域的文化互动。在打破高昌回鹘“素衣”传统的同时,这一转变进一步消解了原有由纹章与饰带构成的装饰

结构,也使原本独特的服饰表现泯然于佛道人物更为常见的织金服饰间。

注释:

①相关考察见格伦威德尔《1902-1903年亦都护城及周边地区考古工作报告》(*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新疆古代佛教圣地——1906-1907年在库车、焉耆与吐鲁番绿洲的考古工作》(*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 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bei Kuča, Quaraš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勒科克《高昌:东突厥斯坦地区首次普鲁士皇家远征队在吐鲁番的重要发现》(*Chotscho: Facsimile-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Turkistan*);勒柯克、瓦尔德施密特《中亚古代佛教艺术》(*Die Buddhistische spaetantike in mittelasien*)第二卷“摩尼教艺术”(Die Manichäischen Ministuren)。

②江南摩尼教绘画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至今对于原藏于日本寺院、博物馆、私人的摩尼教绘画的重新发现。这些绘画为《冥王圣幛》(六道图)、《夷数佛幛》(《虚空藏菩萨画像》或《キリスト聖像》)、《圣者传图》(1,2,3?)、《摩尼教宇宙图》、《天界图》(A、B)、《摩尼像》[地藏菩萨像(マニ像)]、《摩尼诞生图》、《摩尼教曼陀罗残片》(*Fragment of a Manichaean mandala*)。相应研究江南摩尼教绘画的相关学术史吉田丰、古川摄一在其专著中已有表格形式的整理,故不赘述。详见[日]吉田丰、古川摄一编《中国江南マニ教绘画研究》,临川书店,2015,第82-86页。

③有关摩尼教服饰研究最早在部分针对古代高昌回鹘的物质文化研究著作中有所涉及,如冯·佳班的《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及莫尼克·玛雅尔的《古代高昌王国物质文明史》。另外21世纪以来艾伯特的研究在总结摩尼教服饰特点的基础上,也针对摩尼教服饰的纹章及服饰形制可能的西亚来源进行了初步的追溯。[Jorinde Ebert, "Segmentum and Clavus in Manichaean Garments of the Turfan Oasis", Durkin, Desmond ed.,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Conference*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 pp.72-83.]另近年来周菁葆《摩尼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及其服饰艺术》一文亦对摩尼教服饰展开了初步的类型学分析。同时马小鹤《摩尼教宗教符号“妙衣”研究》结合从近东到高昌的摩尼教、景教文本讨论摩尼教中的“妙衣”的犹太—基督教渊源,芮传明《弥勒信仰与摩尼教关系考辨》对比了摩尼教白衣传统与弥勒信仰“白衣”间的异同关系。

④勒科克的早期发现见[德]勒科克著,管平、巫新华译《新疆佛教艺术》,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第133-134页。

⑤依佛教戒律的规定,比丘所可拥有的三种衣服,谓之“三衣”。即:僧伽梨(samghāti)、郁多罗僧(uttarāsanga)、安陀会(antarvāsa)。摩尼教典籍如《摩尼教残经》已经使用“三衣”作比,其中第13-16行提及:“其彼净风及善母等,以巧方便,安立十天,次置业轮及日月宫,并下八地、三衣、三轮,乃至三灾、铁围四院、未劳俱乎山,及诸小山、大海、江河,作如是等,建立世界。”摩尼教的“三衣”为对于佛教的假借化用,用以指代摩尼教风、水、火三种物质。(参考芮传明《摩尼教敦煌吐鲁番文书译释与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第6、26-27页,注29。)

⑥道袍一说为此前国内学界采用的通行说法,蔡鸿生、林悟殊、王媛媛教授在论及草庵摩尼光佛的几乎所有论文中皆提到了这一认识判断,而粘良图在《晋江草庵研究》中则认为其可能来自汉服传统的直裰服饰。参见粘良图《晋江草庵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第45页。

⑦参考张振谦《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袍现象论析》,《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4期。

⑧参考[德]冯·佳班著,邹如山译《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850-1250)》,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第88-89页。

⑨拉丁语文本参考Hegemonius, Hegemonius: Acta Archelai, Charles Henry Beeson. trans.(Leipzig: J. C. Hinrichs, 1906), pp.22-23.

⑩关于摩尼教在罗马与萨珊波斯早期争斗中被迫扮演的角色,参考Lee E. Patterson, "Minority Religions in the Sasanian Empire: Suppression, Integration and Relations with Rome", Eberhard Sauer, *Sasanian Persia: Between Rome and the Steppes of Eurasia*(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181-193.

⑪关于琐罗亚斯德教古代及现代实践中的白色服饰,芮传明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参考芮传明《弥勒信仰与摩尼教关系考辩》,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中心《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9-20页。

⑫中古波斯语原文收录辑英译参考R. Zaehner, *Zurvan. A Zoroastrian Dilemma*(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5), p.322; p.333, Z2:(2).

⑬中古波斯语原文收录辑英译参考R. Zaehner, *Zurvan. A Zoroastrian Dilemma*(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5), pp.374-375; p.377, Z11:(3).此处的“善行”应为琐罗亚斯德教的“三善”之一。

⑭英译参考Ibn al-Nadim, *The Fihrist of al-Nadim: A*

Tenth-century Survey of Muslim Cultur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211-212.

⑮英译参考John C. Reeves, *Prolegomena to a History of Islamicate Manichaeism*(Sheffield/Oakville: Equinox Publishing, 2011), p.55. 词汇 āskīm 注释见 R. Dozy, *Supplément aux dictionnaires arabes*(2 Vols.)(Leiden: E. J. Brill, 1881), pp.1-23. 同见 W. E. Crum, *A Coptic Dictionary*(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p.777. 词汇 istikhūrāt 注释见 G. W. H. Lampe, *A Patristic Greek Lexicon*(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1260.

⑯参考王云《圣哲的衣装——半偏袒式袈裟溯源》,载李军主编《跨文化美术史年鉴2:“欧罗巴”的诞生》,山东美术出版社,2021,第60-63页。

⑰关于丘尼克服饰的发展历程的论述参考Herbert Norris, *Ancient European Costume and Fashion*(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 1999), pp.97-106.

⑱该文本对福音书的应用并不合乎现在通行的福音书文本,而可能与亚述作家他提安(Tatian, 120-180)所编撰的《四福音合参》(Diatessaron, 希腊文:διὰ τεσσάρων)相关。除该文本外, M6005及M18也借鉴了福音书的相关内容,可证明这种对文本的借鉴与改造并非孤例。

⑲该文本最早由宗德曼于1968年发现,并在1981年进行再次梳理,参考Werner Sundermann, *Mitteliranische manichäische Texte kirchengeschichtlichen*(Berliner Turfantexte 11)(Berlin: Akademie-Verlag, 1981), pp.76-77. 英文译本参考H. -J. Klimkeit, *Gnosis 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San Francisco: HarperSan Francisco, 1993), p.72.

⑳《约翰福音》(19:23):“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祂的衣服分为四分,每兵一分;又拿祂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参考中国基督教协会编订《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第129页。)

㉑有关论述参考Herbert Norris, *Ancient European Costume and Fashion*(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 1999), pp.103-110.

㉒善于绘画的摩尼教徒可能参与了拜占庭基督教教堂艺术的创作,如成书于9世纪的《度信者圣迪奥法尔内特事件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便记载了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西奥斯(Anastasios, 491-518)从基齐库斯带来了一位来自叙利亚—波斯的摩尼教画家(希腊文:zōgraphon)并参与都城基督教堂的绘制工作。参考Theophanes(the Confessor) ed.,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 Cyril Mango, Roger Scott tran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7), pp.33, 265.

②帕提亚语原文转写及词汇对照英译参考玛丽·博伊斯(Mary Boyce)对于摩尼教文献的整理, <https://titus.unifrankfurt.de/texte/etcs/iran/miran/manick/manreadc/manre.htm?manre014.htm>, 访问时间:2021年10月。

③参考[日]吉田丰《粟特语摩尼教文献中所见10至11世纪的粟特与高昌关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④官布一词最早由耿世民翻译为“课布”,此前多被视之为麻布或亚麻布,依照郑炳林的研究,其意义事实上包含棉布,敦煌文献可作证明。(参考郑炳林、杨富学《敦煌西域出土回鹘文文献所载qunbu与汉文文献所见官布研究》,《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部分文献中提到了这类在回鹘社会中被用于租税、抵押与寺院供养的“官布”,如同在a寺发现的另一则记载对寺院进行供奉的文书中提及“国王给主教的赠金是十四官布”同时对摩尼教诸神皆有不同数量的“官布”供奉,而在其背面更提及“给了我们十张官布,给了其余的摩尼教社区九十张官布”等说法。

⑤《摩尼教寺院文书》第23-25行,该文书中译最早由耿世民做出,但对原文的转写等处多有谬误(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探》,《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本文采用版本为杨富学参考森安孝夫意见所译版本,全文另有多处提及使用“官布”为僧人及杂役制作服饰的记载。见杨富学《回鹘摩尼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09页。

⑥转引自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第231页。

⑦参考(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一,载[日]小野玄妙编《大正新修大藏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5,第1330页。

⑧转引自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第232页。

⑨参考(南宋)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八,载[日]小野玄妙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106页。

⑩(唐)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11页。

⑪(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五,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第27页。

⑫明万历《福宁县志》卷一五,转引自陈进国、林鋈《明教的新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史迹辨析》,载李少文主编《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文课堂名家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50页。

⑬(明)何乔远编:《闽书》第一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第172页。

⑭杨富学:《霞浦摩尼教研究》,中华书局,2020,第119-124页。

⑮对于摩尼教服饰中的纹样辨识,古川摄一已在其此前研究中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与讨论,详见[日]古川摄一《新出マニ教絵画試論——制作年代をめぐって》,《大和文华》2010年第121期。[日]古川摄一《江南マニ教絵画の図様と表現——元代仏教絵画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に》,载[日]吉田丰、古川摄一《中国江南マニ教絵画研究》,第196-237页。

⑯(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传》,中华书局,1975,第5207页。

⑰范文澜研究率先认为,回鹘接受摩尼教“很大原因是要求奉摩尼教的胡商(九姓胡),帮着回鹘贵族对唐通商致富……”(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78,第95页。)林悟殊亦认为回鹘经济有赖信仰摩尼教的粟特人发展。(林悟殊:《回鹘奉摩尼教的社会历史根源》,《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1期。)关于回鹘对于丝路织物贸易的参与以及摩尼僧在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杨富学已有充分研究。参考杨富学、安语梵《唐回鹘绢马互市实质解诂》,《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路虹、杨富学《敦煌文献所见沙州与周边回鹘的商品贸易》,《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3期。

⑱如《宋史》谈及于阗朝贡时言:“于阗国建隆二年(961)十二月,本国摩尼师贡琉璃瓶二,胡锦一段。”[参考(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中华书局,1977,第14106页。]回赐的案例如:“晋天福三年(938)回鹘朝贡使都督翟全福,并肃州、甘州专使僧等归本国,赐鞍马、银器、缯帛有差。”(北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九七六《外臣部》,中华书局,1960,第11470页。

⑲(宋)洪皓撰,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第15-16页。

⑳(宋)孟元老撰,吴自牧、王旭光校注:《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卷七,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第51页。

㉑(宋)范成大:《揽辔录》,(清)鲍廷博编《知不足斋丛书》本,第6-9页。

㉒转引自沈从文《野人献曝:沈从文的文物世界》,北京出版社,2005,第66页。

㉓(明)宋濂等:《元史》卷一二〇《镇海传》,中华书局,1976,第2964页。

㉔关于纳石失锦的相关讨论参考尚刚《纳石失在中国》,《东南文化》2003年第8期。

㉕(元)佚名撰,陈高华、张帆、刘晓、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卷五八《杂造·禁治诸色销金》,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第1971页。

㉖[意]马可·波罗著,鲁思梯谦、陈开俊译:《马可波罗游记》,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第178页。